

语言哲学视野中的民族语言研究

刘 瑾

(贵州师范大学, 贵阳 550001)

提 要:从语言哲学角度考察民族语言,是拓展民族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主要从语言与存在、语言与生态、语言与精神三个方面探讨民族语言。探索各民族语言的“言说”方式,可以达到对各民族存在特征的认识;探测语言与自然生物生态的隐喻同构关系,可以思考民族语言的发展境况;探寻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可以通向“世界之道”。

关键词:语言哲学;民族语言;存在;生态;精神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1)03-0006-3

A Study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Liu Jin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To study the national langu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can help extend the studies on national languages. This paper aims at discussing national languages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language and Being, language and ecology, language and spirit.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speaking” ways of the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the features of the nationalities can be discovered; through exploring the metaphorically isomorphic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living thing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s can be embodied;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s and spirit, the way to the world can be opened.

Key words: linguistic philosophy; national languages; Being; ecology; spirit

1 引言

研究语言,一般有两个层面:一是微观层面,即语言的音、形、义;二是宏观层面,即语言与其他相关学科形成的交叉领域。对于民族语言,学界从这两个层面都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是,与微观层面比起来,从宏观层面研究民族语言,目前面临着更多挑战。如民族语言的和谐、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力、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化处理、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和保护等,作为民族语言研究面临的一系列挑战,都不是微观层面的语言研究所能解决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主要还是宏观层面的研究难题。到目前为止,已有学者从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等宏观层面对民族语言涉及的一些问题作了一定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语言政策建议和措施。本文也将基于宏观层面,从语言哲学角度探讨民族语言,内容主要涉及语言与存在、语言与生态、语言与精神。

2 语言与存在

在人们的一般意识里,语言往往视为一种交际工具。

也就是说,语言是一种交际符号系统,只有遵从这一符号系统的规则和原理,人们才可能进行交际。因此,语言自然也被人们视为一种交际工具来学习和使用。如此一来,操不同语言的民族在交际中遇到的障碍和误解,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就自然成了对目标语掌握程度的问题。虽然文化常常被视为其中更为重要的问题,或者说语言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但人们一般不是以语言来理解文化,而是以语言来学习文化。在这一点上,语言具有很强的工具性。然而,语言又不完全是工具。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就是存在的家园,语言中包含对存在的显露,而不仅仅是一种用以交流思想的工具,即“语言并非仅仅是人所拥有的许多工具中的一种工具,而正是语言第一次使人有可能处于存在的展开状态之中”(涂纪亮 2007: 29)。语言也因此构成人的历史存在的基础。同时,海德格尔也否定了语言服务于人的传统的关于人与语言的观点。他认为,不是语言服务于人,而是人服务于语言,是语言在说人(海德格尔 2005: 237-271)。可以说,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哲学观点,也为我们从语言哲学角度思考不同

民族语言提供了一个视角。这其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存在于语言中。那么,不同民族语言是否显露不同民族的存在,不同民族语言“说”的是否不同民族?

从逻辑上来说,如果语言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那么不同民族语言呈现的应该是不同民族的存在特征,不同民族语言“说”的也是不同民族。这里,不同民族语言“说”不同民族,并不是指“说”的内容的差异,而主要是“说”的方式的差异。因为对于不同民族的了解,我们既可以通过现象学的还原方式进行观察,也可以通过语言译介接近事实。并且,不同民族在生活、文化、习俗等方面必定存在差异性,因此这些方面作为民族语言的“言说”内容是言之不尽的,但“言说”方式却是相对有限的。此外,不同民族语言也可以“言说”其他民族、语言及整个世界,但其“言说”方式也必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共性和个性,否则就无所谓民族语言及其种系划分。

就此看来,通过探索各民族语言的“言说”方式达到认识各民族存在的特征,是民族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观点。这一观点包含各民族语言“言说”方式与各民族认知方式之间的一种内在哲学关系。在此,我们将语言显露的“存在”重点指向语言“认知”。如果回头审视哲学经历的“本体论→认识论”、“认识论→语言论”的两次转向,就不难理解 A. P. 马蒂尼奇关于“语言哲学使认知科学得以诞生”(马蒂尼奇 1998: 7)的断言。当然,这里谈论的民族语言与民族认知方式是超越个体言语和个体认知方式的民族整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通过各民族语言自身显现出来,即“一个民族的人民总是以同样的独特方式理解词的一般意义,把同样的附带意义和情感色彩添加到词上,朝同一个方向联结观念、组织思想,并且在民族智力独创性与理解力相互协调的范围内同样自由地构造言语。于是,这个民族便逐步使其语言获得独一无二的色彩和情调,而语言则把它获得的这类特征固定下来,并以此对该民族产生反作用”(洪堡特 2008: 204)。因此,研究各民族语言所蕴涵的认知方式,正是接近各民族特征的一个重要途径。

3 语言与生态

语言总是处在一定的变化之中。这些变化既有其内部的原因,也有其外部的原因,而其外部原因往往是影响其内部变化的一个主要动因,如人的认知、交际、社会等因素经常会参与到语言的动态演变中,成为语言演变的主要动力。也就是说,语言不是处于真空之中,它总是处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交互发展过程中。从某种角度来说,语言就是一种复杂的生态系统。正如动植物物种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一样,各种语言与其所处环境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生态联系。或者

说,语言生态隐喻不只是一种形象化的类比,从更深层意义上看,“语言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与自然生物生态之间不但具有某种形式的相似性,而且具有某种程度的内在同构性或相同的内在规定性”(范俊军 2005: 111)。因而,从生态角度思考民族语言,也是我们从哲学角度透视民族语言的一个观点。

对于语言生态问题,有学者将其归结为以下 8 个方面:(1) 语言与语言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2) 濒危语言现象值得重视;(3) 语言污染依然存在;(4) 语言权力受到伤害的情况时有发生;(5) 语码混用带来影响语言生态环境的新问题;(6) 语言竞争引发的社会问题令人关注;(7) 片面对待普通话和方言;(8) 语言规范意识淡薄(冯广艺 2008: 5)。我们认为,民族语言面临的主要生态问题就是许多民族语言的濒危问题。这一问题造成的结果就是语言多样性的丢失。正如生态学中的物种多样性是物种基因适应不同生存环境的结果,物种多样性的丢失必然会对自然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语言多样性的丢失也会对语言生态系统造成破坏。这种破坏主要是一种精神和文化的流失。对此,英国著名诗人和辞典学家 Samuel Johnson 就有过类似的观点:当一种语言消失时我总是很难过,因为语言是民族的族谱。这样看来,某一民族语言的消失,自然从很大程度上蕴涵这一民族特征的消亡。毕竟,没有任何别的形式能够有语言这样全面的承载性。它不仅承载不同民族认知世界的方式,而且可以承载不同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旦某一民族语言出现濒危,那么这一民族的民族特征也就离消亡不远了。

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就民族语言的濒危和消亡问题提出过许多有见解的观点和保护措施,但目前世人对语言危机的了解很有限,远远不及对由环境改变造成生物物种危机的了解。大多数人尚未树立语言意识,如果考虑到世界语言多元化已经或正在受到损害的程度及越来越多的损失,“革命性”这个字眼尚不足以反映语言生态急剧恶化的现状。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要具体讨论各民族语言的发展现状,也不是要预测各民族语言的明天,甚至还不能够对语言和生态之间的关系提出什么重要命题式的哲学思考,但从生态角度来考虑民族语言,其实就已经涉及了哲学的理性思维,而现在急需的就是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

4 语言与精神

对于语言与精神,洪堡特在其论著《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提出过这样的著名论断:“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洪堡特 2008: 52)。因此,在洪堡特看来,语言就是一个民族智能特性的体现,是一个

民族“世界观”的体现。虽然学界就此已有不少探讨,但很多时候出现的都是如中西思维模式差异这样的概论。虽然我们对此也无甚多驳斥,但总觉得民族精神和民族语言并非三言两语所能概述清楚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关于对比语言学的不少研究,其实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也只停留在不同语言的表象上或搁浅在说不同语言的人的文化和思维差异上。然而,顺着民族语言和民族精神,我们所能追求的应不止是差异,而是差异之上的人类语言和人类精神。这就如同哲学转向语言,目的是追寻世界的结构;我们探寻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最终也可以走向“世界”之道。

何谓“世界之道”?就语言学层次来说,“世界之道”就是语言的普遍之理,是人类语言的共性所在;就哲学层次来说,“世界之道”就是世界之理,是整个人类世界存在的基础。在此,如果我们反思P.坎普在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开幕式上的哲学反思,相信我们对于超越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的“世界之道”会有更多的理解。“人们通常遗忘了经济的、技术的和军事的力量并不能拥有独占世界的力量。哲学的论证和反思用言语建立非经济的、非技术的和非军事的力量,言语能够挑战其他力量,揭露谎言和幻觉,提出建立人类生活更美好的世界的思想……然而,即使哲学具有言语的力量,但各种哲学的思考并不都是必定对人类有益的。在20世纪我们已经知道破坏性和灾难性的民族主义、法西斯和其他极权主义的思想给人类带来了什么。这些思想能对某个群体产生真正的诱惑,令人玩味地唤起我们自身中最坏的方面。这最坏的方面不仅形成于我们的自我主义的(egoistic)欲望,而且也是由今道友信(当代日本哲学家——译注)称为‘诺西斯主义的’(nosistic 来源拉丁文 nos, nos 指“我们”的意思)欲望——复数的自我主义、群体自由主义构成的。群体自我主义将人类按不同身份加以划分,将其他每个人或属于另一群体、另一民族或另一文化的异国人视为潜在的敌人”(坎普2008:111)。P.坎普的这段反思不仅让我们看到作为言语力量的哲学,而且也让我们进一步体会到: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是可以由哲学来导向的。但正如P.坎普所意识到的,各种哲学的思考并非都是必定对人类有益的。

如果我们对于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的思考不仅仅限于差异辨别,那么我们可以走到更高的哲学层次之上。但需要时刻留意的是,“哲学地思考(philosophizing)决不

是完全中立的”(坎普2008:111)。它可以在关于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的思考中发挥其正确的导向作用,也可以将我们引向极端的民族主义轨道之上。因此,当我们从坎普的哲学反思中再来反思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的时候,获得的不仅是更深层次的哲学意识,而且还有更艰巨的哲学任务,那就是用积极的哲学理性思维推进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走向“世界之道”。

5 结束语

从哲学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到,哲学并不是因为发生在20世纪初的“语言转向”才开始关注语言,但可以说,哲学对于语言的关注是因为20世纪初的这一转向而凸现出来。到目前为止,语言哲学在语言学研究中的积极作用并不只是表现在澄清语词概念或者构建语言理论方面,而且表现在一种思维视野上。也就是,有了哲学的思维视野,语言学研究就可以跳出封闭的语言结构系统,向任意的理性范畴拓展。这样看来,本文从语言哲学角度提及的几个民族语言问题,只不过是借着已有哲学思想擦出的零星火花。真正关于民族语言的哲学思考,虽然在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已有淋漓表现,但由于哲学思维本身的无形和无限本质,我们期待更多关于民族语言的哲学思考。毕竟,我们都是为了智慧而来。

参考文献

- 范俊军. 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2).
- 冯广艺.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语言生态问题[J]. 贵州社会科学, 2008(4).
- 海德格尔.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涂纪亮. 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M]. 湖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 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坎普. 反思作为言语力量的哲学——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开幕式关于反思当今哲学的主旨演讲[J]. 世界哲学, 2008(6).
- 马蒂尼奇. 语言哲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